

# 政策利害關係人的分析：

## 以老人福利修法為例

林淑萱

### 壹、前言

當世界各先進國家正尋求解決人口老化問題的有效對策時，臺灣也正為人口快速老化（與先進國家比較）、少子化的社會問題感到苦惱，亟思由老人福利政策的檢討，制定更完備的法案，建構更整合性的資源網絡，提供更有效能的福利服務，來滿足老人的福利需求，並減緩問題的壓力。

老人福利政策的制定受到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等層面及其彼此互動的影響，因此，其政策分析顯得極為錯綜複雜。本文擬由民國 86 年老人福利法修法（主要是當時立法院內政與邊政、司法、財政聯席委員會審查該法案）的過程，涉入的政策利害關係人（policy stakeholders）其角色扮演與運作，彼此的互動關係以及對修法的影響，乃至法案的修正對其影響等加以探討與分析。

### 貳、老人福利修法的背景

#### 一、老人福利修法的因素

民國 69 年制定老人福利法之後，有關老人福利的服務輸送與相關措施，其宣示意義大於實質福利；加上老人年齡界定為

70 歲過於偏高，引發修法的建議與質詢迭起。尤其臺灣社會變遷快速，民國 82 年 9 月時 65 歲以上的人口已超過總人口數的 7%，進入聯合國所界定的人口老化國家，因此，高齡化社會的福利需求更加殷切與急迫。

行政部門於民國 81 年才展開修法草案的研擬，但是其中多項重要條文，例如：降低老人年齡至 65 歲、規劃國民年金保險、充實地方專業人員的工作人力等，卻因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反對，打出推動「三代同堂」的一貫政策，將老人照顧推回家庭繼續承擔重責。這樣的思維與動作引發部分學者與社會福利實務界的不滿，因此，學者胡幼慧後來出版「三代同堂—迷思與陷阱」，「民間版」的老人福利修法小組也因應產生，主要由老盟邀集學者與實務工作者擬稿，並獲得全臺各地 38 個老人團體的支持（吳玉琴，1999：76～84）。

有關老人年金會成為政治議題主要與選舉策略密切連結。民國 82 年 2 月澎湖縣長補選，民進黨推出高植澎醫師以年金為政見，居然打破一向由國民黨執政的局面。因此，時任行政院長的連戰與其後的內政部社會司長白秀雄都指示成立國民年金研議小組，並且規劃辦理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該年底縣市長選舉，老人的經

濟安全議題掀起熱潮。但隨後執政黨贏得選舉，老人福利法修正版本又多達 12 個（行政院版加上立委提出 11 個不同版本），致使老人福利法修正案在立法院又擱置二年多未審查。民國 85 年底由於老盟主動政策倡導，立法院才又召開第三次聯席會議審查該修正案。

總之，老人福利修法反映老人的福利需求未獲得滿足，行政部門雖確認該問題的存在，但沒有積極的作為；各政黨為了贏得選舉，將老人福利視為政治籌碼；最後是民間團體臨門一腳，藉由遊說、施壓，讓政策議題公眾化等策略的靈活交互運作，終於將修法的迫切性取得多數立委的共識與支持。

## 二、政策利害關係人

有關政策利害關係人的定義，因為涉及到個人的行為、互動的對象，以及整體的社會脈絡等，產生解釋上略為不同。以下就國內外學者的說法摘述於後。

(一) Jansson, B.S. (2003:70) 指出政策利害關係人有以下 11 類：1. 利益團體的領導者與成員；2. 倡導團體（尋求積極政策改革）；3. 與該方案有關的行政官員與幕僚；4. 立法者與其助理；5. 政府首長（民選）；6. 政府監督機關與提供資金者（註：如同行政院主計處、財政部）；7. 特定政策或議題的消費者或受益者；8. 地方政府的規範體系（如：護理之家的查核機關）；9. 專業團體（如：社工人員全國協會）；10. 利益團體組成的聯合會；11. 政黨領導人。

(二) Dunn, W.N. (1994:70) 界定政策利害關係人為受到公共政策影響或影響公共政策，對政策冒風險的個人或團體，例如：市民團體、勞工聯盟、政府機關、民選領袖與政策分析家等皆是。他們對政策環境

的同一訊息，明顯地有不同的反應方式。

(三) 國內學者吳定 (1998:149) 對政策利害關係人的定義：受到某項政策方案直接或間接、有形或無形影響的人員，包括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的人員在內，因此它的範圍比「標的人口」(target population) 要為廣泛。例如老農福利津貼政策的利害關係人除了 65 歲的老農外，還包括他們的家屬。

(四) 朱志宏、丘昌泰 (1995) 則將政策利害關係人概分為三類：1. 政策制定者 (policy makers)：這是指產生、運用與執行政策的個人或團體。2. 政策受益者 (beneficiaries)：政策制定過程中直接或間接受到利益的個人或團體。3. 政策受害者 (victims)：政策制定過程中，喪失其應得利益的個人或團體。喪失的原因可能是政策設計失當，未將他們列為利害關係人；或者政策本身引起副作用，對該個人或團體產生負面的影響；或者該個人或團體欠缺顯著的政治地位與立場；或者為機會成本下的必然犧牲品。

綜合上述，本文界定老人福利法的修法涉及的政策利害關係人包括：行政部門（首長與科層人員、顧問等）、立法部門（立法委員，尤其是當時審查該法案的內政與邊政等委員會）、政黨、老人福利推動聯盟（以下簡稱老盟）、利益團體（當時未立案的業者組成的中華民國關懷老人托顧服務協會、臺北市銀髮族關懷協會）以及老人與其家屬六大類。

## 參、修法的過程分析與衝擊

Lindblom 指出，政策研究應該要瞭解政策制定過程中參與者的特性、其扮演的

角色，所擁有的資源與權力，以及彼此如何牽制與互動 (Lindblom, 1980:2-3)。以下就六大類的成員在修法過程中的角色與運作，彼此的互動與角力，對法案的影響，以及法案修正後對某些成員的直接衝擊等加以分析。

### 一、行政部門的角色與運作

一般民眾認為法案的制定或修訂，立法部門居首要的角色。但是學者 (朱志宏, 1995: 152, 王仕圖等, 1999: 145~152) 指出，行政部門已經成為政策的主要發源地，行政科層是社會政策的主要推動者。從行政科層的政治觀點，其權力根源一方面來自於他們在政策過程中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是他們作為專業技術的角色。行政科層最重要的資源是專業技術與資訊的控制，這也是他們擁有權力的基礎。當政府越依賴行政科層的力量時，行政科層人員的影響力及在政策制定上的角色會隨著提高份量，無形中行政科層的權力也就逐漸增加。

行政官員或是政策制定者較少直接由研究報告中獲得資訊，其資訊主要來自中介者 (intermediaries) 如：幕僚、專家、遊說者；另一來源是選區 (constituencies) 如：選民、利益團體 (Kemper, 2003: 437-438)。然而研究科層體制的學者指出，科層傾向於保護預算，維持現狀，及在其所處的系統中狹隘界定情境，而非通盤考量 (陳恆鈞等譯, 1998: 104)。或許這是政策制定的盲點與障礙。由老人福利修法過程中，社政與衛政未整合，導致老人福利機構的設置標準不一、名稱混淆不清等缺失，這是當初行政院版社政與衛政在科層體制下堅持分工明確的思維之結果。此外，有關特別照顧津貼原本民間版

是希望全面發放，但是行政科層擔心財務負擔太重，後來在施行細則第 11 條中規定，給付對象僅限於中低收入戶老人。

總之，行政部門透過專業技術與資訊的優勢，形成政策或法案制定的源頭，立法院各委員會審查法案時，也會邀集相關的行政部門列席，顯然立法部門相當仰賴行政部門提供資訊等協助。老人福利修法也顯示版本雖多，但是，除了第 9 條老人福利機構部分採用民間版本，第 16 條特別照顧津貼也是採用民間版本外，老人保護設有專章，以及未立案機構設有 2 年緩衝期的落日條款等經由協商，大致上都採用行政院版。至於受邀列席的行政官員來自內政部、衛生署、行政院主計處、財政部、法務部等機關 (立法院公報, 1997a, 1997b)。

### 二、立法部門的角色與運作

根據立法學者 Jewell & Patterson 的研究，立法者與體系內或體系外的人發生許多互動行為，形成以下各種角色取向：選區角色、利益團體角色、政黨角色、行政角色、代表角色、目的角色及結構角色等七種類型 (羅傳賢, 2002: 464~465)。事實上立法者角色具有多面向且富動態性及變遷，難以單一與片斷事件來評論立委的角色取向。但是由老人福利修正案立委們所提出的 11 個版本中，有 5 個版本對於未立案老人福利機構禁止營業且課以罰金，表現出選民的委任代表或成為選民的差僮 (errand boy)；或是憑自己的判斷做決定的法定委託者，其代表角色取向明顯化。有些立委則會考慮到業者的生存空間，提出放寬免辦財團法人登記的標準，或是給予緩衝期予以改善，因此，帶有部分利益團體取向的色彩。

若將立法部門角色與行政部門角色作比較，由聽證(hearing)的參與式民主，「立法聽證」較「法規聽證」為民眾所知悉，可發現前者決策過程較公開，同時政治考量多於專業考量。現代民主先進國家的國會，大多設置常設委員會以協助院會先行處理議案，並提供審查意見供院會參考，用以消化處置為數龐大且具專業性質的法案，並且節省院會審查法案時間。以老人福利修正案為例，因議案性質涉及府院與跨部會的相關事宜，院會決定交付內政及邊政、財政、司法聯席會議審查。

根據第四次聯席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 1997a)，我們可以由以下事實瞭解立委的議事效能與態度。(一)出席委員發言：出席委員 20 人，列席委員 35 人，發言委員(包括主席)共 16 人，顯示發言率不到三成。(二)議事專業表現：發言內容有些流於作秀，有些藉機發牢騷，有些言不及義，雖然提出版本多達 11 個，但是如前所述，最後大多採用行政院版。(三)議事效率：一天上下午各 3 小時共計 6 小時內審查完成。其專業素質究竟如何？根據立委羅傳進等人的說法(立法院公報, 1996)，立法院助理研究人員不足，致使立法品質粗糙，影響立法權之充分行使。立法諮詢中心助理編制才 11 名，如何充分配合 164 位委員的問政需要？立委廖學廣在聯席會議上發言也提到委員會應該專業化，而非個人化；院會應政黨化，而非委員化，如此才能提升議事效率(立法院公報, 1997a)。

立法部門對政策的影響力在解嚴之後(1987 年)有重大的轉變。過去在威權體制的嚴控下，立法部門淪為行政部門的「橡皮圖章」；但解嚴之後，隨著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自由化，社會文化的多元化，

立法部門已取得更為寬廣的空間，各種利益團體遊說立委的活動也相繼展開，這意涵立法部門對政策的影響力與權力的擴充正與日增強。

### 三、政黨的角色與運作

國外學者 Hill (林鍾沂等譯, 2003: 122~124) 指出，在政策制定複雜過程中，政黨的政治輸入難免會被稀釋，但是政黨在塑造其政策立場時，意識型態顯然是很重要的。在意識型態衝突是公開的，以及各自立場強烈爭執的地方，政策過程中的政黨角色將會非常顯著，特別是在政策過程的早期階段。再者，Ripley & Franklin (1991:74) 研究國會與行政科層的互動指出，當政策議題屬於資源重新分配，前二者間潛在性的高度衝突源自政黨與意識型態的差異。

老人福利修正案雖然也屬於重新分配的政策，但由問題轉化為議題、議程的過程，顯示當時的國民黨、民進黨與新黨三大政黨對該法案並無明顯的意識型態的差異。同時，立法院提出的 11 個版本中，國民黨立委提出的有 6 個版本(黃明和、朱鳳芝、吳耀寬、洪昭男、李顯榮、徐中雄)，民進黨立委提出的有 4 個版本(黃信介、蘇煥智、陳哲男、黃爾璇)，新黨則有趙少康，三大政黨皆參與其中，因此，交付政黨協商的條文，例如：第 9 條老人福利機構的設立，老人保護專章，未立案機構的緩衝期限(第 28 條)，都很快就協商完成。

事實上當時並無明文規定委員會黨團協商的機制(91 年「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修法新增訂 10-1 條才明定之)，但政黨協商的確提供國會運作的政治橋樑，尤其是提升議事效率。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委員會黨團協商的機制跳過反覆討論

的程序，喪失公開辯論的機會，也是一種損失（許劍英，2004：256）。

#### 四、利益團體的角色與運作

關於利益團體的定義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依據國內學者李允傑（李允傑等，2003：19）引用 Truman, D.B. 的說法，所謂利益團體是指共同分享態度的團體，他們經常對社會中的其他團體進行要求或呼籲，如果對政府機關進行施壓的活動，並且企圖影響政府機關的公共政策，利益團體就變成壓力團體。

觀察利益團體的活動與運作，其為有自主性的組織，產生的目的在於促進團體或公眾的利益（如促使國會制定新法案或修法），或是阻止不利於該團體或公眾的政策；或是密切在國會旁聽、監督法案的審查。為分析的方便，本文將政黨與老盟（民間團體）另外歸類，僅將當時未立案的老人福利機構之業者組成的中華民國關懷老人托顧服務協會、臺北市銀髮族關懷協會等界定為利益團體。當老人福利法即將三讀時，他們集結至立法院抗爭，意圖阻撓老人福利法的通過，理由是：老人福利法第9條不利於他們的生存（養護機構只能照顧無技術性護理需求的老人，而大多數業者收容的對象是插管的老人），且新的老人福利法規範了未立案的老人福利機構之罰則，又加上一年（後來考量子法訂定時間太倉促而修訂為二年）落日條款（吳玉琴，1999：80）。

雖然未立案機構的存在當時是非法的、欠缺正當性（legitimacy），但是仍舊發揮其功能，促使政府正視未立案機構存在的嚴重性；另一方面彼此聯盟向立委遊說，提供資訊，表達對政府法規過於嚴苛的不滿。由於各政黨的團結一致，老盟又

發動老人團體與其對峙，因此，利益團體對法案的影響力有限。誠如學者指出（李允傑等，2003：21；朱志宏，1995：92），凡是涉及層面較為狹窄的事務，政黨很少表明其立場，而選區也少有興趣或意見者，利益團體最能發揮其效能。雖然國內利益團體存在，但並非如美國般活躍，更何況公民參與對多數人而言仍是興趣不大，即使是團體成員，也不見得會進行遊說或施壓的活動。因此，在國內並不存在由行政部門、國會委員會與利益團體構成的「鐵三角」。

#### 五、老盟（民間團體）的角色與運作

老盟是一個由多個老人團體及社會福利團體組成的聯盟（coalition），理監事為老人團體及社會福利團體所共同組成，秘書處則是由理監事會聘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組成，組織本兼具「案主」及「倡導者」雙重性質（陳正芬，2002：238）。雖然聯盟一般指的是暫時性的聯合，塑造出凝聚力，予以支持某一特定議題（Jansson, B. S., 2003:368），但是老盟結合政策利害關係人中的老人團體與專業團體，進而定位為老人政策倡導團體，所呈現的老人主體是以國家公民為出發，代表老人向政府爭取權益，並以此認定自己是老盟的「主人」，因而專業人員成為輔助的「客人」（王增勇，2000：297）。

既然老盟代表老人團體表達其意見、想法與理念，甚至向國會立法部門請願，密切在國會旁聽、監督法案的審查，其如何有效交互運用政策倡導的策略？根據 Kenny-Scherber（2003:274）的經驗，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參與政策倡導或諮詢的角色，其介入的方式包括：（一）針對單一議題或個別問題而與政治人物或行政科層接觸

溝通；(二)地方性議題需要持續進行遊說，在媒體公開曝光，達到促使政治人物研究其成因的目的；(三)透過募集捐款，形成會員較多的組織，內部有政策專家、對抗或遊說等專業人員等構成壓力團體；(四)邀集專家，連結政府次級體系與行政科層共同行動。以上不同層次的活動對於政策的影響力由小而大有所不同。

在老人福利法修法過程中，老盟結合學者、專家、實務工作者與老人團體的共識與理念，提出「民間版」，並展開第一波的接觸，拜會立委與請願；第二波行動則遊說各黨立委請其支持優先排入審查；第三波則在審查會旁聽，展開立法的監督與辯護，形成壓力團體；第四波動員老人團體代表與利益團體形成對峙局面，後來由新黨帶著業者與老盟進入協商。由老盟靈活運用結盟、遊說、媒體等策略，是社工界政策倡導的典範，因此，修法的版本中除了行政院版外，採用最多的就是民間版。

老人倡導團體的影響力如何？首先就其在政治上享有的優勢，包括：1.有大量積極成員可進行和決策者接觸的工作，2.政策資訊和專門知識，3.迅速與政府官員聯繫的非正式管道，4.廣大的社會支持和身為政府津貼領取者的合法性（林歐貴英等譯，2003：633）；其次，就老人福利修法後媒體對老人議題的報導多會邀請老盟參與；第三，政府部門邀請老盟進入決策體制（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小組）。

為維繫民間非營利組織得來不易的成果，個人認為可以多接觸北部以外其他地區的老人團體，邀請他們加入團體會員，擴展老人參與公共事務的領域，增進其專業知識與能力。

## 六、老人與其家屬的角色與運作

老人與其家屬在政策利害關係人中代表選民身分，原本選民是結構鬆散的個體，但是經由組織動員後可以形成利益團體，也可以如老盟代表老人團體與民間社會福利團體的聯盟。由於臺灣社會對於協助老人的看法一般是正面的，認為他們是值得幫助的群體，因此，立委也將老人福利修法定位為民生法案，在取得共識與合法性，老人福利修法的過程雖然有些小波折，但是還算平順通過。

反觀美國社會從 1980 年代開始，美國老人就被媒體和決策者視為一個有組織的貪求者（greedy geezers）團體，以整體聯盟的行動來達成其利益。有些人認為，老人的經濟利益其實是奠基於年輕族群的耗費上（林歐貴英等譯，2003：633）。事實上這樣的觀點容易導致代間不公平（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的緊張與衝突。

臺灣的老人是否沒有能力自組倡導團體？Jansson（2003:75-78）提出政策才能（policy competencies）有四：1.政治才能：運用媒體、充權（empowering）他人、尋求倡導方案的基金等資源、開發與使用個人的權力資源等；2.分析才能：發展方案、力場分析、展現方式的設計、診斷執行的障礙、分析政策與議題的脈絡、設計政策預估等；3.互動才能：聯盟、展現、組織與維護任務團體、處理衝突等；4.釐清價值的才能：從事倫理的推論。曾任職老盟的學者王增勇（1999：294）指出，並非臺灣的老人沒有能力或專業人員才有執行能力，而是在參與政治論述上，老人需要借重專業人員的所學，將其生活經驗轉換為政策語言，才能取得發言地位。以上所述顯示，老人在為自己爭取權益，其影

響力仍然受限於現實狀況無法完全發揮。

只有在選舉的煙硝迷漫中，最能感受到老人的存在。各地老人會會長往往是候選人競相爭取的樁腳，政客對老人投以關愛的眼神，老人福利議題被炒得震天價響，讓人感覺到臺灣的老人享有的福利是「殘餘的」(residual)，並沒有全盤完整性的規劃；對於身為老人照顧者的家屬，其福利更是被邊緣化。

## 七、修法後的衝擊

### (一)法制的落實與監督

自修法公布實施後，行政部門並沒有積極作為，相關子法與輔導未立案的老人安養護機構等業務均無回應民間的需求，未立案機構問題終於在臺北縣慈民安養中心大火事件後引爆，老盟聯合立委召開公聽會，後來甚至與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聯合向監察院控告社會司失職（陳正芬，2002：244～253）。

社會司於1998年底委託老盟辦理「未立案老人安養護機構輔導立案」說明會，老盟扮演的角色有1.政府與業者間的協調者；2.行政院研考會管制監督的資訊提供者；3.對負責輔導立案的地方政府施壓之行動者。其運用的策略包括：使用個人的權力資源（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小組委員）提案促請政府重視該問題、運用媒體公布各縣市輔導未立案機構的績效。

行政部門與業者間的衝突當然涉及雙方都是政策的利害關係人，但是行政科層所制定的行政命令，除非對執行者是有意義且可行，或是改變執行者重視的誘因，否則這些法規經常是達成目標的絆腳石（Wilson, 1989:345）。為此，老盟與專家、業者策略聯盟，診斷執行的障礙，並居中協調處理衝突；實地測量老人寢室樓地板

面積等所得數據，提供社會司研擬修正老人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的參考。

### (二)終結未立案的老人安養護機構

老人福利修法後對於未立案業者的影響最大，落日條款2年將屆滿的當月，根據當時（1999）臺灣省政府統計，全省的老人安養機構中，只有80家有申請立案，508家則未完成申請。省府表示，未立案的老人安養機構經查獲，依法可處以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的罰鍰，並得連續處罰及公布名單。同日新聞刊登，未立案業者認為法中有許多歧視小型養護機構的條文，且相關子法於半年前才公布，時間上過於倉促，揚言將繼續抗爭（中央日報，1999）。

利益團體由於欠缺正當性，在老盟積極捍衛老人權益下，有許多根本無法立案的機構，例如：違建而違害公共安全、機構建在山坡地或水源保護區、土地分區使用不符規定者等，猶如困獸之鬥，仍苟延殘喘。老盟提出半年內分級輔導，並繼續監督各縣市政府輔導未立案老人安養護機構。

### (三)未能立案的照顧問題

當初老盟提出民間版修正案極力主張老人福利機構的設立，應該整合衛政與社政，並且關照到照顧失能老人的家庭，全面發給特別照顧津貼。如前所述，前瞻性的政策因某些因素未被採納或落實，造成日後失能老人的照顧問題。如今，衛政體系下設立「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社政體系下又設立「照顧管理中心」，不僅有疊床架屋的缺憾，一般民眾對於繁雜的機構名稱也難以辨識。

再者，失智老人的照顧因未能有效宣導，專業的日間照護中心有限，當初修法也未預估其需求，造成失智老人家庭的重

擔。以上事實顯示，人口老化的速度快於政府的因應措施，其間失調現象就是社會問題的根源之一。

## 肆、結語

本文由各類型政策利害關係人的角度來分析其在修法的角色、社會關係與運作，乃至對法案的影響，以及修法後的衝擊等加以論述，其結論如下：

一、行政部門雖然擁有專業技術與資訊的優勢，形成修法的發源地；但是心態保守，科層體制下力主分工明確與權責劃分清楚，以及法規訂定未考量執行與落實的問題，因此，行政部門的整合、行政部門與業者的利益衝突、老盟控告行政部門與老人權益的維護等問題浮現。

二、立法部門的角色是多元且動態，議事考量政治多於專業，雖然透過委員會審查法案與政黨協商機制來提高議事效率，但是議事的倫理與品質仍然有待提升。

三、政黨在此次修法過程中並未顯示其重要性，最有可能的因素是：各政黨事先已有共識，定位為民生法案，彼此意識

型態的差異性小。

四、利益團體在臺灣社會的活動不像美國般活躍，所以由行政、立法與利益團體構成「鐵三角」的關係並不存在。雖然他們有脫軌的行為，但這是常態社會秩序組成的部分，也凸顯行政科層法規制定的部分缺失，督促政府重新檢視與改進。

五、老盟憑藉其在老人倡導團體取得政治的優勢地位，以及靈活運用各種政策倡導與行政監督等才能，終於能獲得政府與民間甚至部分利益團體的專業認同與支持。但是老盟作為老人團體的代言人，應該擴展與開發北部地區以外的資源，同時加強老人的權能，提升老人政策論述的才能。

六、老人與其家屬雖然角色上視為選民，但老盟成員與其有部分重疊。臺灣社會對於老人的協助大多持肯定，少有年齡上的歧視（ageism）；但是制度規劃未臻完備，老人福利容易淪為選舉的政治籌碼；照顧失能老人的家屬目前雖有喘息服務（respite service），但是協助仍然有限。  
（本文作者為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 參考文獻

- 王增勇（2000）誰代表老人發言？收錄於蕭新煌、林國明主編，臺灣的社會福利運動，臺北市：巨流，257～307。
- 王仕圖、官有垣（1999）社會政策過程中行政科層與國會互動之研究—以社會救助法之修訂為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3（1），141～177。
- 中央日報（1999）未立案業者揚言續抗爭，[www.cdn.com.tw/daily/1999/06/03/text/880603c3.htm](http://www.cdn.com.tw/daily/1999/06/03/text/880603c3.htm)，88年6月3日。
- 立法院（1996）第3屆第2會期第22次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第85卷第64期（上），88。
- 立法院（1997a）內政及邊政、財政、司法三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老人福利法相關修正案，立法院公報，第86卷第12期（下），249～310。



- 立法院 (1997b) 老人福利法—完成三讀, 立法院公報, 第 86 卷第 31 期 (上), 97~229。
- 朱志宏 (1995) 公共政策, 臺北市: 三民。
- 朱志宏、丘昌泰 (1995) 政策規劃, 臺北縣: 空大。
- 吳玉琴 (1999) 老人福利政策的倡導—以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為例, 社會建設季刊, 102, 76~84。
- 吳定 (1998) 公共政策辭典, 臺北市: 五南。
- 李允傑、丘昌泰 (2003) 政策執行與評估 (修訂版), 臺北市: 元照。
- 林鍾沂、柯義龍、陳志瑋譯 (2003) 現代國家的政策過程 (三版), 臺北縣: 韋伯文化。
- 林歐貴英、郭鐘隆譯 (2003) 社會老人學, 臺北市: 五南。
- 陳正芬 (2002)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在未立案養護機構法制化過成中的倡導角色之分析,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6 (2), 223~267。
- 陳恆鈞、王崇斌、李珊瑩譯 (1998) 政策制定的過程, 臺北縣: 韋伯文化。
- 許劍英 (2004) 立法審查理論與實務 (增訂四版), 臺北市: 五南。
- 羅傳賢 (2002) 立法程序與技術 (增訂三版), 臺北市: 五南。
- Dunn, W.N. (1994)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NJ: Prentice- Hall.
- Jansson, B.S. (2003) Becoming an Effective Policy Advocate. (4th. ed.) CA: Brooks /cole.
- Kemper, P. (2003) Long-term Care Research and Policy. The Gerontologist 43(4):436-446.
- Kenny-Scherber, Carol (2003) Active Citizenship, social Work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Anne Westhues (Ed.), Canadian Social Policy. Ontari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 Lindblom, C.E. (1980)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2nd ed.) NJ: Prentice- Hall.
- Ripley, R. B. & Franklin, G.A. (1991) Congress, the Bureaucracy, and Public Policy(5th ed.) CA: Brooks / cole.
- Wilson, J.Q. (1989) Bureaucracy: 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 USA: Basic Books.